

□ 特勒拉吉 (Tel Lakhish / Tel Lachish)

以色列古物管理局 (IAA) 官方考古報告中文翻譯

□ 原始來源

期刊：Hadashot Arkheologiyot—Excavations and Surveys in Israel (HA-ESI)

卷期：134

報告作者：Katharina Streit and Felix Höflmayer

日期：2022

報告編號：HA-ESI Volume 134

發掘許可：G-45/2017, G-22/2018, G-67/2019

官方網址：https://hadashot-esi.org.il/report_detail_eng.aspx?id=26125

插圖：原文插圖全部由以色列古物管理局提供

緒論

2017–2019 年每年 7 月至 8 月，一支奧地利—以色列考察隊在特勒拉吉 (Tel Lakhish / Tel Lachish) 進行了重啟發掘，最初代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 (2017–2018)，其後由奧地利科學院東方與歐洲考古研究所主持 (許可編號 G-45/2017、G-22/2018、G-67/2019；坐標 185546–714/608147–306)。持續進行的發掘屬於一項名為「追蹤轉變」(Tracing Transformations) 的計劃，由奧地利科學基金 (FWF START 資助編號 Y-932) 資助。發掘由 K. Streit 與 F. Höflmayer 主持，協助者包括 L. Webster (放射性碳測年取樣；S 區主管)、A.-K. Jeske (P 區主管)、J. Dye (資料庫管理、攝影)、M. Waclawik (測量、無人機攝影、方格主管)、M. Budner 與 S. Kostadinov (3D 建模、方格主管)、A. Woitzuck (AutoCAD 繪圖、方格主管)、J. Tlusta (S 區攝影、方格主管)、L. Indra (無人機攝影、方格主管)、A. Godo (P 區攝影、方格主管)、V. Kellie (資料庫管理、方格主管)、M. Plesška (繪圖、方格主管)、O. Cohen (文物保護) 及 E. Yannai (顧問)。

特勒拉吉位於示非拉 (Shephelah) 地區，納哈爾拉吉 (Nahal Lakhish) 南岸。該遺址最初於 1932 至 1938 年由英國韋爾科姆—馬斯頓考察隊 (Wellcome-Marston Expedition) 發掘，由 J.L. Starkey 主持 (Torczyner et al. 1938；Tufnell, Inge and Harding 1940；Tufnell 1953；1958)。1966 至 1968 年由希伯來大學在 Y. Aharoni 主持下重啟發掘 (1975)，1973 至 1993 年由特拉維夫大學在 D. Ussishkin 主持下發掘 (2004g)。較近期，2013 至 2017 年間，Y. Garfinkel 與 M. Hasel 代表希伯來大學及南復臨大學進行發掘 (Sass et al. 2015；Weissbein et al. 2016；2019；Garfinkel et al. 2021)，S. Ganor 則於 2015 及 2016 年進行搶救性發掘 (Ganor and Kreimerman 2018；2019)。

特拉維夫大學考察隊先前發掘的兩個區域 (S 區與 P 區；圖 1；表 1；Ussishkin 2004f) 是奧地利—以色列考察隊的發掘重點。今次發掘沿用前考察隊的方格佈局及區域、方格命名慣例；這使今次考察隊得以與前次發掘的層位 (locus) 建立精確對應。層位按先前的編號系統登記，並以 TAU- 前綴標示特拉維夫大學的層位。

選擇這兩個發掘區域，目的是以更高精度測定土丘上中青銅時代至晚青銅時代過渡的年代，方法是自可靠的層位脈絡取得絕對放射性碳測年數據。重啟發掘亦旨在重新評估此過渡期間物質文化的變化——當時南黎凡特數個重要遺址 (包括拉吉) 都有顯著的毀滅層。這些事件長期以來被與埃及在黎凡特的軍事行動聯繫起來，作為驅逐喜克索斯人及重新控制三角洲地區的一部分 (Weinstein 1981；Dever 1990；Burke 2010)。然而，Hoffmeier (1989) 指出，埃及與黎凡特事件同時性的可信證據不足。近年基於放射性碳測年發展出埃及歷史時期絕對年代學 (Bronk Ramsey et al. 2010；Dee 2013a；2013b)，意味著關於埃及與黎凡特事件對應關係的假說，現今得以相當精確地加以檢驗。

表 1：S 區與 P 區的地層與絕對放射性碳年代（綜合特拉維夫大學與今次考察隊數據）

晚期青銅 IIIB（1200–1130 BCE）：S 區第六層（VI）；晚期青銅 IIIA（1300/1250–1200 BCE）：S 區第七層（VII）；晚期青銅 II（1350–1300/1250 BCE）：S-1、S-2，P 區第四層（IV）；晚期青銅 II–IB（1425–1350 BCE）：S-2、S-3；晚期青銅 IA（1500/1450–1425 BCE）：S-3、P-3（過渡階段）；中期青銅 IIB（1750–1550 BCE）：P-4、P-5；中期青銅 IIA（2000–1750 BCE）：P-6。鐵器 IIB（800–701 BCE）：S 區第三層（III）、P 區第四層（IV）；鐵器 IIA（850–800 BCE）：S 區第四層（IV）；鐵器 I（950–850 BCE）：S 區第五層（V）；晚期青銅 IIIB 前有間斷（Hiatus）。

S 區

S 區位於土丘西緣。此區最初開設以記錄土丘的完整地層序列，但因計劃終止及安全考量，在到達晚青銅時代地層時提前結束（Barkay and Ussishkin 2004a；2004b）。此區原本包含十四個方格（10 × 35 公尺），沿東西向剖面排成兩列。重啟發掘僅限於此區西部的十二個原方格（C–D/8–13），並擴展至兩個新增方格（B12、E12），合共約 200 平方公尺。

此區的工作迄今主要集中於進一步揭露晚青銅 IB 與晚青銅 II 的 S-3 層——該層由特拉維夫大學考察隊首次揭露。今次發掘主要揭露了一座紀念性建築（W1027）及該時期相關建築的遺跡，其中數座在先前發掘中已部分揭露。較晚地層——S-2、S-1（晚青銅 II）及第七層（晚青銅 IIIA）——的少量遺跡，在兩個新開方格及拆除舊土壁、修整剖面時揭露。

S-3 層（圖 2）：歸屬於此層的大部分遺跡屬於三個使用階段（c–a），顯示此層跨越了相當長的時期。部分牆體由特拉維夫大學考察隊首次揭露，其他則為新發現。一道特別長的東西向牆橫貫 C/9–12 方格（W1027=TAU-W1075/W1077；寬 1.2 公尺，長 17 公尺，保存高度 1.7 公尺），似乎是紀念性建築的南牆。該建築的東南角在 C9 方格揭露，顯示其向北延伸；而其西南角似乎位於土丘最邊緣，可能隨時間崩塌，或在較晚建造階段被覆蓋（見下文 W1220）。紀念性建築在 S-3 層整個時期（c–a 階段）都存在，似乎是一座精英或公共建築。在 D12 方格發現的另一段牆（W1127）可能也在此層整個時期存在。

可解釋為土丘西緣防禦系統的牆體遺跡，代表 S-3 層三個使用階段中最早者（S-3c）。這些遺跡包括一道南北向牆（W1220），連接一座建築——可能是塔樓（W1127、W1163、W1221、W1227）。牆 1163 緊接上述 W1127——後者在此層期間持續使用——顯示 W1027 所屬的紀念性建築可能也是此防禦系統的一部分；然而，這些建築之間的關係仍有待釐清。一座可能的扶壁（W1219）及一道牆（W1222）可能亦屬防禦系統，不過它們保存狀況相當差，與系統其他遺跡的關係仍屬推測。

W1027 南側較樸素的建築遺跡，分別屬於 S-3 層的三個使用階段。歸屬 S-3c 層的一些牆在 C–D/11 方格發現（W1232 與 W1215 形成一個角落，以及 W1130）。揭露了一處地面（L1223），東側緊接 W1130、南側緊接 W1027。覆蓋 1223 地面的填充層出土了重要遺物，其中包括兩枚聖甲蟲印（圖 3）及兩件加工骨器（L1200/B11314、L1201/B11294），全部距地面不到 0.15 公尺。另一道歸屬 S-3c 層的牆（W1081）在 C9 方格發現。在先前出版物中（Streit et al. 2018:262–263），此牆曾被暫定歸屬較早的 S-4 層，因為其基礎置於比同一方格內 W1027 更深的堆積中。然而，此歸屬其後已修訂，因為 W1027 在 C12 方格的基礎位於比 C9 方格所見更深的堆積中。只有進一步發掘 W1081 的基礎，才能釐清它是否早於 W1027。

兩道歸屬 S-3c 階段的牆——塔樓（？）建築的 W1163 與 W1130——似乎在下一個使用階段（S-3b）仍繼續使用，與 W1027 和 W1127 並存。在此階段豎起了三道牆：W1192、W1199 與 W1161，封堵了 W1130 與 W1027 之間的通道。在相鄰通道被封堵後，W1027 與 W1192 之間安裝了一座土灶（tabun，L1141）。亦屬此階段的有一層燒焦沉積透鏡體（L1150），在 C12 方格發現，位置接近預期應有 S-3b 地面之處，但未偵測到地面。在透鏡體附近、大致同一高度，發現了一件帶早期字母系統文字的陶片（ostrakon）（L1114/B10969；Höflmayer et al. 2021）。

此層最晚的使用階段 S-3a，以牆體遺跡為代表（自西向東：W1162=TAU-W1105、L1043、W1071=TAU-W1103/W1097、W1028=TAU-W1089、W1032=TAU-W1087），它們沿 W1027 南側形成整齊的空間，包含兩至三個封閉房間。這些牆大部分在特拉維夫大學發掘時首次揭露，當時歸屬 S-3 層。與這些牆相關的原位陶器顯示，在 S-3a 層時期，此處主要是居住區。發掘中未辨識出此階段的明確地面。

S-2、S-1 與第七層：S-2 與 S-1 層的遺跡在數個位置發現，不過並不一定能明確歸屬其中一層。S-2 層以一系列富含陶器與有機遺存的緻密焚燒紋層為特徵，先前被描述為沒有建築（Barkay and Ussishkin 2004b:337–342）。此類紋層在 C–D/10–11 及 D12 方格的土壁中發現。雖然它們先前被解釋為打穀場（Barkay and Ussishkin 2004b:342），此處則建議這些紋層更可能代表廢物棄置區，因衛生原因經歷了連續有意的焚燒。後一種解釋與紋層中發現的大量陶器更為吻合（其他遺址類似特徵的描述，見 Webster et al. 2019a:90）。亦歸屬 S-2 層的有數個坑（例如 D/11–12 方格的 L1110）及填充層（B12 方格的 L1204、L1205 與 L1212）。位於 1204 與 1205 填充層之下的 1212 填充層，出土了一件帶僧侶體（hieratic）銘文的陶片（圖 4）。由於此發現距坡緣不到 0.5 公尺，且上方未有明確脈絡封閉，其地層歸屬略為含糊；它最可能屬於 S-2 層，但亦不能排除歸屬 S-3 層。

第七層的遺跡包括一層約 0.5 公尺厚的橙色土坯磚碎屑與燒焦物質堆積（L1197），在 B12 方格東剖面揭露；Ussishkin 亦在相鄰的 C12 方格描述過此堆積（第 3783 單元）。此堆積覆蓋一處可能的土質地面（L1228），出土兩件可修復的器皿（其中一件有裝飾）、另一件器皿的一部分及一件石杵。那件裝飾碗側面有多處標記，暫被解釋為字母文字。在 E12 方格北剖面偵測到一處陶器集中（L1172），似乎是原位。C8 方格西剖面發現一個坑（L1036=TAU-L3950；直徑 2 公尺），亦歸屬第七層。坑中出土了兩件石柱礎或柱頭碎片（Streit et al. 2018: 圖 5），令人想起先前在第六層衛城神廟中發現的建築構件（Ussishkin 2004c）。

P 區

P 區位於土丘西北部；先前出土並拆卸的猶大宮殿—堡壘（Judean Palace-Fort，公元前九至八世紀）的西北角佔據此區東南端（Ussishkin 2004e）。P 區亦發現一座神廟（Ussishkin 2004c）及居住建築（Ussishkin 2004b），兩者均屬晚青銅時代，以及一座中青銅時代宮殿建築（圖 5；Ussishkin 2004d；200 與 300 號牆由特拉維夫大學考察隊揭露；部分牆體形狀奇特的末端，是因為上方猶大宮殿限制了通道）。

今次計劃在特拉維夫大學考察隊開設的三個方格（E8–9、F9）中繼續發掘，並在原區域以東開設了七個新方格（D–G/10、E–G/11）。新方格出土了先前在 P 區記錄的所有地層遺跡：最東面方格的一道鐵器時代 II 擋土牆（？）（第五與第四層）；晚青銅時代居住建築（P-2/1 層）；以及中青銅時代宮殿建築向東的延續（P-4 與 P-3 層）。在 P-4 層一處抹灰地面之下，有宮殿更早階段的遺跡，其確切地層歸屬（P-6 或 P-5 層）仍不確定。

P-6 或 P-5 層：中青銅時代宮殿的早期階段（圖 5）。特拉維夫大學考察隊記錄了一座建築的孤立遺跡，推測為 P-4 層宮殿的早期階段，並歸屬 P-5 層（Ussishkin 2004d:146–151）。今次發掘可能在 E9 方格、P-4 層一處抹灰地面（TAU-L5010）之下發現了此階段的更多遺跡。一道西南—東北向石牆（W2128；寬約 2 公尺），保存至少七層高，在地面以下 0.2 公尺處發現。雖然牆上方一處填充層（L2110）出土大量早期青銅時代陶器，但自北（L2131）與自南（L2130=L2142）緊接該牆的填充層則指向中青銅時代年代。W2128 究竟是 P-5 層的一部分，還是中青銅宮殿建築更早階段（P-6 層）的一部分，尚不清楚。由於其高度比 E8 方格揭露的 P-5 層相鄰牆（W2003）低 0.22 公尺，它更可能屬於 P-6 層。

P-4 與 P-3 層：中青銅時代宮殿（圖 5）。P-4 層的宮殿建築——在此階段或為初建，或大幅擴建——包含兩翼——南翼與東翼——環繞一個庭院。該建築其後被毀，不久後部分修復（P-3 層），但最終遭受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毀滅（Ussishkin 2004d）。先前曾有人提出，P-4 層宮殿建築部分內襯的大型石板屬次生利用，源自 P-5 層的建築（Ussishkin 2004d:155）。

重啟發掘進一步探索了東翼的一部分，揭露了似乎是建築東立面的一段（W2013B/W2057、W2026）。此立面圍成兩個大房間，極可能還有第三個房間，位於其南。兩個明確辨識的房間中較南者略大，延伸覆蓋 E–F9 與 G9–

10 方格的大部分範圍。一座緊接 W2057 的扶壁 (W2117)，與先前發掘中此空間對側辨識到的扶壁 (TAU-W371) 相對應；這些扶壁分隔了兩個房間。這些房間的牆、扶壁與地面均以白色石灰基灰泥抹面 (圖 6)。一道此空間南牆 (W2025、W2032) 的門口顯示存在一個先前未記錄的房間。此房間牆壁亦為石灰抹面，但因位於猶大宮殿—堡壘之下而未能發掘。

東立面牆 (W2026 與 W2013B/W2057) 的東面未抹灰，而其東側的地面則為石灰抹面。一條排水道 (L2151) 與這兩道牆平行、位於其東，可能保護它們免受雨水損害。此區域位於立面以東，經兩道立面牆之間的門口進入，應解釋為一個露天庭院。

P-4 層宮殿建築的毀滅痕跡大量出土。在 W2025 與 W2026 圍成的角落 (L2146) 發現大片帶木樑印痕的石灰灰泥。這些灰泥遺跡被燒焦的土坯磚包圍，因此似乎是猛烈大火中坍塌的天花板遺跡。毀滅層的類似殘餘在 W2026 與 W2013B/W2057 以東、W2025 以南發現；W2025 以南亦發現一根大型燒焦木樑 (L2084)。此毀滅層的碎屑基本不含遺物。

在 P-3 層時期，宮殿建築第一次毀滅的碎屑被就地整平，覆蓋以一層品質較差的抹灰地面，比 P-4 層地面高 0.22–0.40 公尺。此地面在發掘區各處發現零星片段，而保存較好的一段 (L2083) 在 G10 方格辨識出來，該處地面緊接 P-4 層宮殿的抹灰牆及一道 P-3 層的牆 (分別為 W2025 與 W2065)；W2065 僅在剖面中可見，與 W2025 相鄰。沿牆建造的土坯磚長凳似乎與宮殿在其兩個使用時期 (P-4 與 P-3 層) 相關 (由於長凳大多建造粗糙，發掘中常難辨識——僅在垂直切割時可見——因此未顯示於平面圖上)；這些長凳的用途仍不清楚。

P-3 層時期加建於宮殿建築的構件包括一座土坯磚構築物 (長凳或牆)，緊靠 P-4 層抹灰牆 (L2025、L2026) 形成的角落而建，以及被 G10 方格南剖面切過的 W2065。宮殿建築房間中發現的燒焦土坯磚碎屑填充，證實其最終毀滅。P-3 層碎屑中僅出土少量遺物；其中包括一座幾乎完整的雪花石膏獵鷹小雕像，以及一件部分可修復的賽普勒斯紅彩陶碗 (Red-on-Red bowl) (圖 7)，在宮殿建築東翼最南的房間、W2025 附近發現。

P-2/1 層：晚青銅時代居住建築與坑 (圖 8)。特拉維夫大學考察隊將這兩層描述為保存狀況不佳的晚青銅時代居住建築遺跡，呈西北—東南排列。重啟發掘中發現的類似遺跡一般歸屬 P-2/1 層，因為新舊遺跡之間尚未偵測到直接關聯，而與牆相關的遺物亦不足以作更精細的地層歸屬。

兩道相接的牆 (W2015、W2031) 及一系列相鄰的牆 (W2008、W2011、W2013A/W2022) 顯示存在兩個房間。另兩道牆 (W2012 與 W2018) 似乎屬於此建築的不同階段，但由於保存狀況差，無法確定它們代表較早還是較晚階段。P-2 層牆壁所受的大部分破壞由晚青銅時代較晚階段 (可能是 P-1 層) 的坑 (例如 L2126，尤其是 L2049) 造成。2049 號坑 (直徑 1.9 公尺，深 1.6 公尺) 遺物特別豐富，包括數十枚貝殼、十七顆珠子、一件完整水壺、一件原位壓碎的碗，以及一件邁錫尼直壁雪花石膏瓶 (alabastron) (圖 9；Mountjoy 1986:73–74, 圖 84, Furumark 形制 94)，年代屬希臘晚期 (Late Helladic) 兩個階段 (LH IIIA2 與 LH IIIB)；此器物的近似對比物見於特勒巴塔什 (Tel Batash) 第七層 (Steel 2006:156, 照片 75；另見 Greener 2015:218–219)。

第五與第四層：鐵器時代。特拉維夫大學考察隊在 P 區僅辨識出第五層的薄弱遺跡 (Ussishkin 2004e)。其上為第四層的遺跡，包括猶大宮殿—堡壘、北附屬建築及一個庭院，合稱「B 宮」(Palace B)。這些建築在公元前 701 年亞述攻擊後重建——這些遺跡被稱為「C 宮」(Palace C) (Ussishkin 2004e:774–776)。

P 區最近的發掘僅重溯了北附屬建築的一部分，包括三道平行牆 (TAU-W9511、TAU-W282、TAU-W281) 東端近乎方形的平台，於 2019 年拆除。一道南北向排列的三段牆 (W2101、W2102、W2072；E–G/11 方格；以下稱 W2072) 與北附屬建築平行，並與一道東西向牆 (L2042) 形成圓角。W2072 牆極可能是擋土牆，支撐 P-4–3 層宮殿建築毀滅的土坯磚碎屑——北附屬建築即建於其上。此由以下特徵所示：其相當高 (約 2.5 公尺)；其略微向西傾斜，朝向北附屬建築內部；以及它只有一面正式牆面——位於東側。

W2072 東側緊接一些短小、建造粗糙的土坯磚牆，顯然是扶壁，之間為均質填充。這些牆幾乎難以辨識，僅在切過它們的剖面中識別出來 (例如 W2118；圖 10)，顯示它們與擋土牆 (W2072) 同屬地下下部結構。這類扶壁之上覆蓋兩層連續的地面及一層約 0.2 公尺厚、富含瀝青塊的堆積。未來揭露更大的水平範圍，將可釐清這些遺跡究竟屬於第五層還是第四層。

在整個發掘季節中，於 S 區與 P 區對結構良好的有機物質進行密集取樣作放射性碳測年，自新開方格及舊剖面均取得材料。分析聚焦於短命植物材料，以獲得適合貝氏分析的極精確年代序列。分析在格羅寧根大學及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放射性碳實驗室進行。此計劃整合的放射性碳序列，同時考慮了近期測定及特拉維夫大學考察隊取得的較早年代（Carmi and Ussishkin 2004）。結果及其意義的討論已另行發表（Webster et al. 2019a；2019b）。

為 S 區建立的放射性碳序列（S-3c-a、S-2、S-1、第七、第六層）顯示，S-3 與 S-2 層的年代比先前發掘者所推測者明顯更早：並非先前兩層均定於公元前十四世紀晚期（Ussishkin 2004a:57–60），S-3 層的年代被推前至公元前十五世紀後半（約公元前 1450–1420 年曆法年代），S-2 層則定於公元前十四世紀前半（約公元前 1420–1350 年曆法年代）。

這套修訂年代學消除了先前指出的、特勒拉吉考古證據與文字資料之間的明顯矛盾：Ussishkin（2004a:58）指出，在公元前十五世紀後半，土丘缺乏佔居證據——而阿蒙霍特普二世（Amenhotep II）時代的埃爾米塔日紙草 1116A 背面（Papyrus Hermitage 1116A verso）提到南黎凡特數城（包括拉吉）遣使前往埃及（Epstein 1963）。修訂的放射性碳序列將 S-3 層歸入此一時期，從而證明當時該遺址存在一個組織良好的聚落，有能力遣使往見埃及法老（Webster et al. 2019a）。P 區亦已建立類似的放射性碳序列，尚待發表。

在特勒拉吉 S 區與 P 區的三個發掘季節，顯著增進了我們對該遺址晚青銅時代層位考古與年代的理解。S 區一個坑中發現的石柱礎或柱頭底座，可能證明此區附近存在一座先前未記錄的神廟或精英建築。對 S-2 層沉積紋層結構的重新考慮，指出它們應解釋為有意的廢棄物堆積，而非打穀場——儘管這需要進一步研究。S-3 層紀念性建築基於其龐大規模及相關小件遺物（包括聖甲蟲印、骨器及帶僧侶體與原始迦南文字銘文），被解釋為精英住宅或公共建築。這些銘文將使研究者得以重新評估該地區文字的發展。

基於密集放射性碳測年的 S 區修訂年代學，為 S-3 層提供了公元前十五世紀後半的絕對年代。這建立了此佔居層與埃爾米塔日紙草 1116A 背面提及拉吉使者之間的對應。此外，特勒拉吉的年代與其他黎凡特及埃及遺址支持高年代中青銅時代年代學的放射性碳證據一致，中青銅至晚青銅過渡或早在公元前 1600 年即已發生（Höflmayer 2015；2019；Höflmayer et al. 2016a；2016b）。

P 區的發掘透過揭露中青銅時代（P-4 與 P-3 層）宮殿建築東翼的更多部分及其東側的庭院，增進了對其建築佈局的理解。P-4 層地面以下的發掘揭露了此宮殿較早階段（P-5 或 P-6）的遺跡，主要是一座巨構牆。中青銅時代遺跡以東，發掘出土了一道似乎是鐵器時代的擋土牆，為猶大宮殿—堡壘建築群的佈局與建築提供了新資訊。對這些遺跡（可能屬大型下部結構的一部分）的進一步調查，將可釐清此建築群究竟屬於鐵器時代 IIB 還是 IIA。

參考文獻

（完整參考文獻請見原文。以下為主要文獻：）

Aharoni Y. 1975. Lachish V: Investigations at Lachish; The Sanctuary and the Residency（特拉維夫大學考古研究所出版物 4）。特拉維夫。

Barkay G. and Ussishkin D. 2004a. Area S: The Iron Age Strata. In D. Ussishkin ed. The Renewe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Lachish (1973–1994) II. 特拉維夫。頁 411–503。

Barkay G. and Ussishkin D. 2004b. Area S: The Late Bronze Age Strata. In D. Ussishkin ed. The Renewe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Lachish (1973–1994) I, II. 特拉維夫。頁 316–407。

Bronk Ramsey C., Dee M.W., Rowland J.M., Higham T.F.G., Harris S.A., Brock F., Quiles A., Wild E.M., Marcus E.S., Shortland A.J. 2010. Radiocarbon-Based Chronology for Dynastic Egypt. Science 328:1554–1557。

Dever W.G. 1990. 'Hyksos', Egyptian Destruc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Palestinian Middle Bronze Age. *Levant* 22:75–81。

Epstein C. 1963. A New Appraisal of Some Lines from a Long-Known Papyrus. *JEA* 49:49–56。

Garfinkel Y., Hasel M.G., Klingbeil M.G., Kreimerman I., Pytlík M., Carroll J.W., Waybright J.W.B., Kang H.-G., Choi G.D., Chang S.-Y., Hong S., David A., Weissbein I. and Silberberg N. 2021. The Canaanite and Judean Cities at Lachish, Israel: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Fourth Expedition 2013–2017. *AJA* 125/3:419–459。

Höflmayer F., Misgav H., Webster L.C. and Streit K. 2021. Early Alphabetic Writ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Missing Link' from Tel Lachish. *Antiquity* 95:705–719。

Sass B., Garfinkel Y., Hasel M.G. and Klingbeil M.G. 2015. The Lachish Jar Sherd: An Early Alphabetic Inscription Discovered in 2014. *BASOR* 374:233–245。

Streit K., Webster L.C., Becker V., Jeske A.-K., Misgav H. and Höflmayer F. 2018. Between Destruction and Diplomacy in Canaan: The Austrian-Israeli Expedition to Tel Lachish. *NEA* 81:259–268。

Torczyner H., Harding G.L., Lewis A. and Starkey J.L. 1938. Lachish (Tell ed-Duweir) I: The Lachish Letters。倫敦—紐約—多倫多。

Tufnell O. 1953. Lachish (Tell ed-Duweir) III: The Iron Age (2 卷)。倫敦—紐約—多倫多。

Tufnell O. 1958. Lachish (Tell ed-Duweir) IV: The Bronze Age。倫敦—紐約—多倫多。

Ussishkin D. ed. 2004g. The Renewe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Lachish (1973–1994) (特拉維夫大學考古研究所專著系列 22, 5 卷)。特拉維夫。

Webster L.C., Streit K., Dee M.W., Hajdas I. and Höflmayer F. 2019a. Identifying the Lachish of Papyrus Hermitage 1116A Verso and the Amarna Letters: Implications of New Radiocarbon Dating. *Journal of Ancient Egyptian Interconnections* 21:88–99。

Webster L.C., Streit K., Dee M.W. and Höflmayer F. 2019b. New Radiocarbon-Based Assessment Supports the Prominence of Tel Lachish during Late Bronze Age IB–IIA. *Radiocarbon* 61:1711–1727。

Weinstein J.M. 1981. The Egyptian Empire in Palestine: A Reassessment. *BASOR* 241:1–28。



圖 3：S 區 S-3c 層聖甲蟲印（左—L1200/B11406；右—L1216/B11412）

IAA HA-ESI Fig.3



圖 4：S 區 S-2 層（？）僧侶體銘文陶片（L1212/B11391）

IAA HA-ESI Fig.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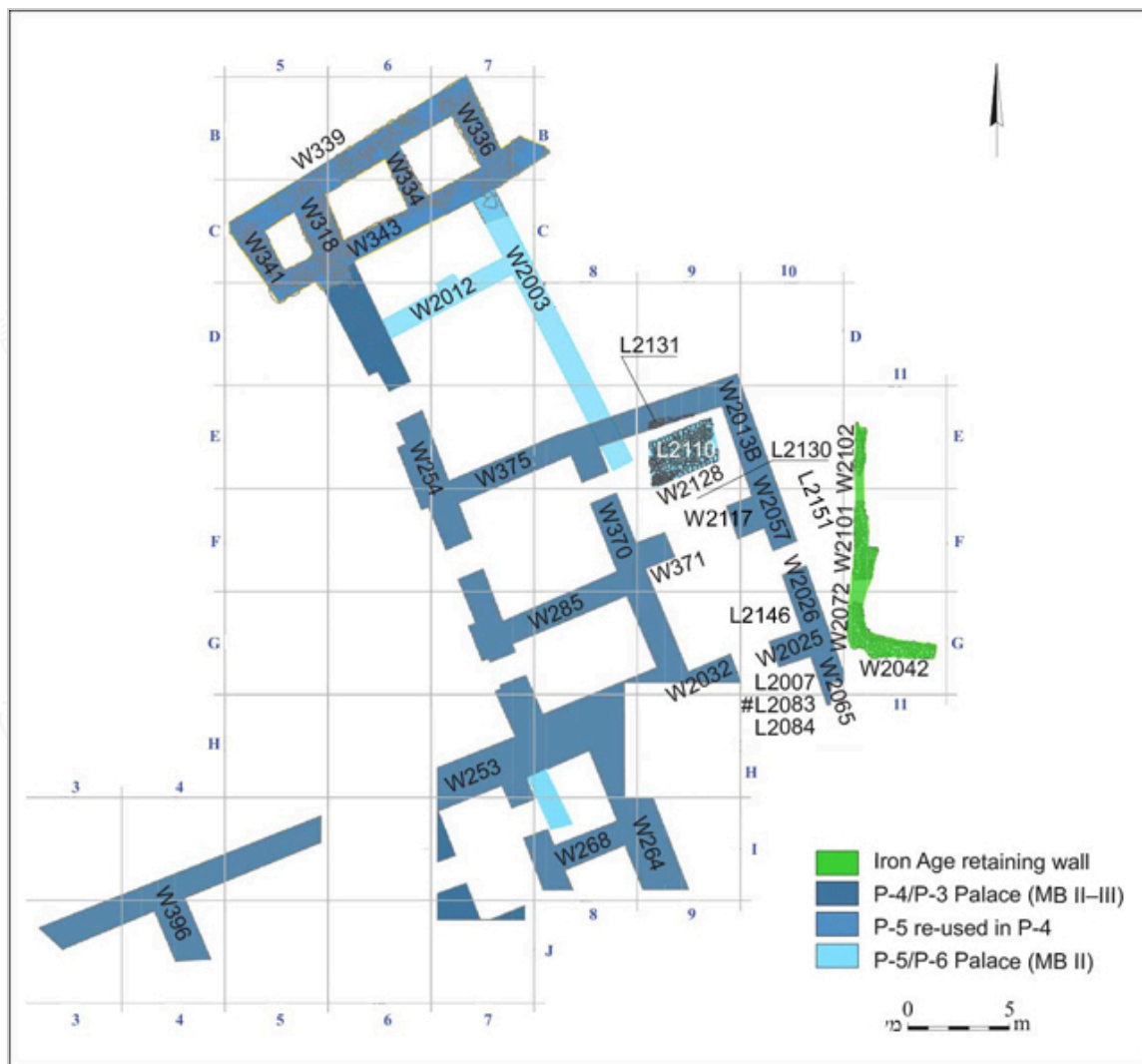


圖 5：P 區 P-5/6-P-3 及第四層平面圖

IAA HA-ESI Fig.5



圖 6：P 區 P-4/3 層抹灰房間，自東南望

IAA HA-ESI Fig.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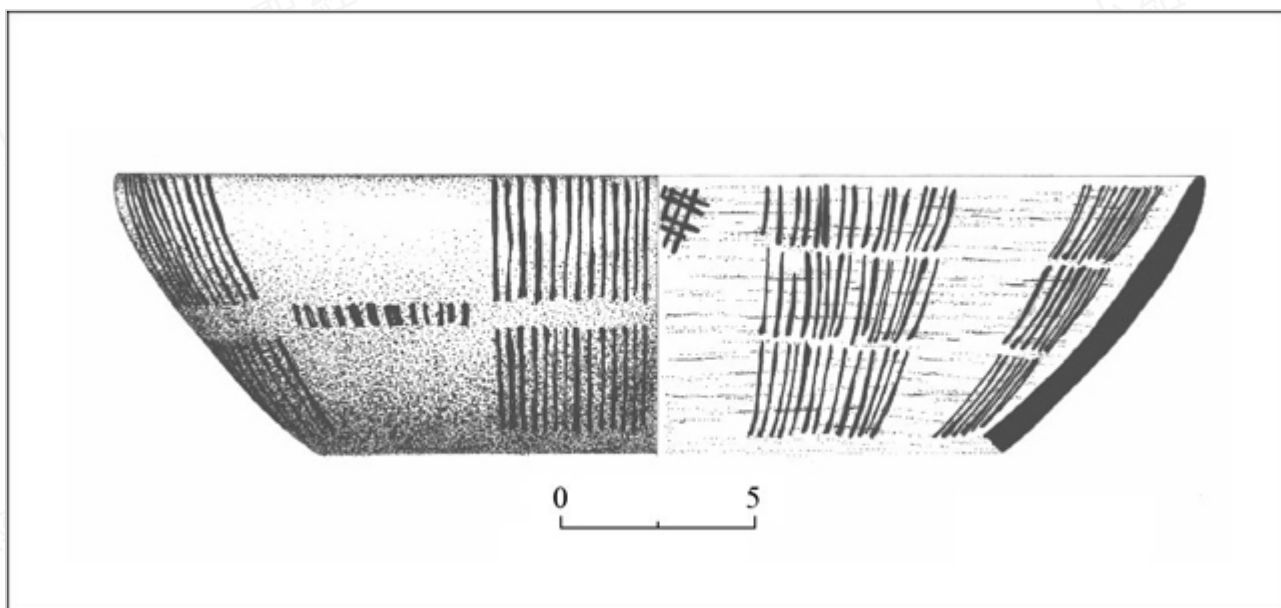


圖 7：P 區 P-3 層紅彩陶碗 (L2007/B20340)

IAA HA-ESI Fig.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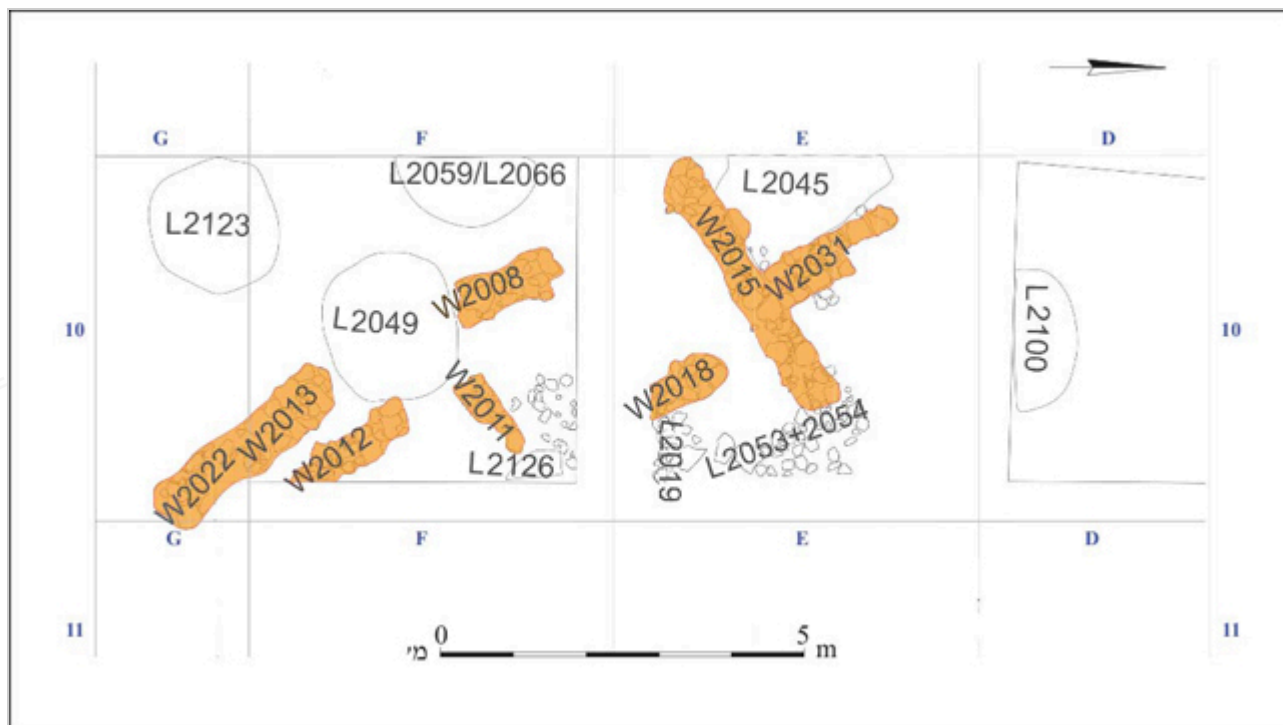


圖 8：P 區 P-2/1 層平面圖

IAA HA-ESI Fig.8



圖 9：P 區 P-2/1 層直壁雪花石膏瓶（L2049/B20320、B20325）

IAA HA-ESI Fig.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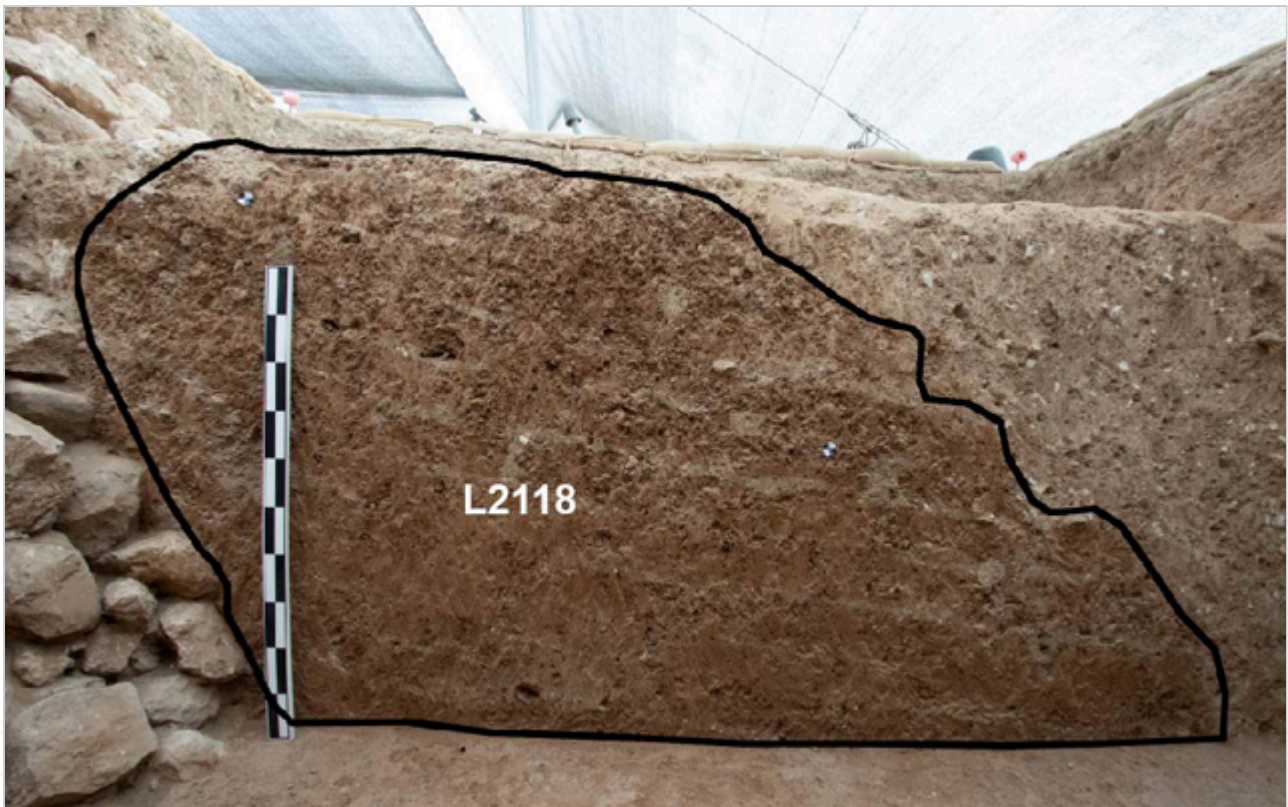


圖 10：P 區第五/四層土坯磚扶壁

IAA HA-ESI Fig.10

本中文翻譯僅供學術與教育用途，由「笑著行聖經調查小組—聖經研究部—BiblePI協編」製作。原始報告：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 Hadashot Arkheologiyot (HA-ESI)。版權 © 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HA-ESI 期刊為開放取用 (Open Access)。商業用途須 IAA 書面許可；轉載須註明出處。聯絡：info@chantochi.com · <https://chantochi.com> · WhatsApp/Telegram +852 9108 5024

發掘許可編號：G-45/2017, G-22/2018, G-67/2019 (可對照 IAA 網站資料序號)

—本翻譯僅供學術與教育用途·笑著行聖經調查小組—聖經研究部-BiblePI協編—

聯絡：info@chantochi.com

<https://chantochi.com>

WhatsApp/Telegram+85291085024

